文学中的妓女形象

我就“Prostitute literature and social criticism”这一主题自选阅读的书目是《羊脂球》（莫泊桑《羊脂球》，黄秋妮 译，连环画出版社，2005）、《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岳麟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和《台北人》（白先勇《台北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与文学中的妓女形象联系起来的两个首要问题就是：文学中的妓女形象是什么样的的？妓女在文学所描写或揭示的社会中是什么地位？这些作品都可以看做对这些问题的各自的一种回答。

从有人以来，就几乎一直有性的事业。妓女在传统的社会中，原先是“不适宜被提及”的形象。可是文学整体来说似乎有一种天然倾向于描写妓女的趋向。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历史与传统上来说，在爱情被提高到现在所拥有的主要的地位之前，婚姻大多是由外来命定的，而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中，寻花问柳从而成为常事；另一则在与文人所天生的对于传统的反叛，以及作为文人敏感天性的永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可是有时现实却是如此的可贵，竟真与想象相合，例如《聊斋》中的许多的绮丽的幻想。

在文学作品中，妓女的形象久而久之形成了不同的“范式”。第一种是作为“堕落”的象征。这是因为妓女被认为带有巨大的道德问题，并与罪恶的滋生与场所相关联。原先可能或是因为穷苦，或是因为命运无情的戏弄而成为了妓女，可是却沉沦在金钱利欲的大千世界里。而在这之中又衍生出了一种变体。那便是在妓女身上所带有的“真情”。因为妓女本身从事性与爱相区分的职业，而经历又颇多，因而妓女的情便更有戏剧冲突。这强烈的社会批评性的意味就在于：在社会的种种困难与阻挠，或是因为经济、或是因为阶级、或是因为世人的眼光，爱最终不得不分隔开了。而又与传统的爱情挫折的悲剧不同的是，因为妓女本身所带有的社会意味，又使作品的主题有了更为朝向社会的一面。例如《台北人》中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作品，妓女旧情复燃，将自己从前失去的爱情投射到他人身上，可是尽管如此，她也明知自己从此就与他要相隔，或是不能产生或培养出真情的。

第二种范式则是将妓女写成最纯真、最善良的人物，从而与她们那世人眼中“肮脏“的职业，和她们所处的最污秽的场所，甚而与最低劣的社会产巨大而鲜明的反差。而妓女与社会的邪恶产生的强烈的对比，例如《羊脂球》中有身份的乘客为了各自私利恳求一位妓女，而在目的达到后纷纷再次疏远她，这产生了巨大的反讽意味与伟大的悲剧的情感；又或是《罪与罚》中的索尼娅，成为了精神的救主，等等。但在将妓女描写为纯真的形象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另外一种，例如沈从文的许多描写湘西的作品，将妓女的纯真与环境的自然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想象的传统的桃花源，展现了部分的风土人情。

同时，妓女，作为一种女性主体，其与险恶的环境的对抗本身就是女性的坚强的证明。日本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常有的女性文学就着重于描写女性所受的苦难与顽强，以及在这之中绽放的生命的活力。动人的女性互相之间的情谊与帮助也是经久不衰的主题；又或是在社会的异化下女性之间反而互相争斗的表现。例如成濑巳喜男导演的电影《女人步上楼梯时》，或是沟口建二导演的电影《祇园歌女》等等作品。

最后，在长久以来隐而不发的性与欲望的探索中，以及上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的思潮中，妓女作为与“性”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的形象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可是，我们看到，在这两种强调“性”的思潮之中，女性被视为客体，例如日本永井荷风的作品或萨德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性作为自发的存在，才是真正的主角；与女性作为自由的主体，性作为解放女性的力量，而女性才是真正的重点——这两种互异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